

以青春叙事激活中国运河的文化记忆

——电视剧《北上》创作谈

□ 姚晓峰



缘于二十年运河梦旅

我出生于江苏，幼年生活在长江边，也算是依水而生的人。犹记得，小时候随父母去看运河，河道不宽，岸边多是堤坝和农田，四周杂草树木丛生，河道上却跑满了货船，一条条首尾相连，一眼望不到尽头。自此，运河便在我童年的时光里，悄然种下眷念的种子，魂牵梦绕。2014年，大运河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，我便一直希望，有一天能用我最熟悉的影像方式，去呈现故乡的运河，让更多的人领略它的独特魅力。

2018年，我读到徐则臣的长篇小说《北上》，仿佛遇见了命中注定的创作契机。这部以京杭大运河为母题的作品，既有百年时空的纵深，又有个体命运的沉浮，将运河与文明的共生关系娓娓道来，深深打动了。徐则臣笔下那条“流淌着中国人集体记忆”的运河，与我心中那条承载着童年与乡愁的河流，在那一刻重叠了。我与徐则臣的第一次对话，是在南京的一家咖啡厅里。两小时的畅谈，我们达成了共识：运河不仅是地理的坐标，更是文化的血脉，我们在改编中要展现的，是运河人与运河解不开的情缘。

然而，将这部结构独特、意蕴深邃的小说搬上荧幕，绝非易事。原著以意大利人小波罗前往中国寻找弟弟马福德为线索，串起清末、抗战、当代三个时空，文学性与思辨性极强。在影视化的呈现上，我们需要剥开文字，看到文字里更凝练的精神内核、更具象的人物情感。为此，我和编剧赵冬苓老师拉上徐则臣，共同组建了“运河采风团”，从扬州到淮安，沿着运河路访半月，追溯岁月足音，探寻

沿岸人家。沿运河一路走来，随处可见的是新时代下运河散发的勃勃生机：我们采访开书店的老板、送外卖的小伙，做船运的水上人家；见到大量回乡创业的年轻人，他们注重内心精神的修养，他们的善良、真诚和乐观深深打动了。这些年轻人让我们感怀，大运河申遗成功后，焕发新生的运河和年轻的生命浑然一体，也正是在与他们沟通交流的过程中，我们萌生了改编的思路，并最终确立了以“花街小院”为核心的叙事方向——用青春的目光看待历史，让运河的浩瀚与市井的烟火交融，让百年历史通过一群“90后”的成长与回归徐徐展开。

生生不息，熠熠昭彰

从文学到影视的转化，是“择取与再创造”的过程。

我选择了以2000年后的运河为故事主线，而花街的构建是改编的关键。这座虚构的江南院落，既是物理空间，更是运河精神的浓缩。我们耗时近三个月，在苏州运河段搭建整条花街实景，从青石板路到晾衣绳的剪影，从清晨的油墩子香气到傍晚的炊烟，每一处细节都力求还原运河人家的生活肌理。在第一集中，童年夏风华领着初来乍到的马思艺穿行花街小院，4分13秒的长镜头串联起小院中五户人家、十五个人的日常。这也是运河“生命力”的视觉隐喻——每户人家相邻而居却活出了迥然不同的生命色彩。

故事的脉络是这样的：2000年前后，小院人家靠水而生，运河的繁荣滋养了沿岸家家户户，所有人安居乐业、欢喜富足。然而，时代浪潮袭

来，京沪高速公路的开通使运河航运式微，也深刻影响了运河人家的命运。2007年，孩子们高考在即，在困顿中，他们逐渐了解到生活的艰辛，因而向往北上寻找出路。在青春的烦恼、生离死别的考验里，他们历经无数个失眠的夜晚，终于如愿却不那么如意地离开了家乡。大城市的汲汲营营令人疲惫，而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，为他们的人生打开了新的篇章。运河应势重生，在北京积累了丰富的五位青年，鼓起勇气重返家乡，将在故土上、运河边重启一番作为。

在影像呈现上，我将水元素贯穿始终，紧密交织着人物的命运与情感。童年时，他们在运河里摸鱼嬉戏，水是他们的乐园；青春期，他们沿运河北上求学、闯荡，水成为离乡的航道；成年后，大运河申遗成功的消息唤醒了他们的根脉，水又化作归乡的纽带。运河就像他们生命的足迹，这种“出走—回归”的循环，正是运河“生生不息”、运河人乐观向上的精神写照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、生活如何困顿，这群普通人始终秉持着积极的希望。这份坚韧向阳的信念，如暗夜行舟的桅灯，引领他们穿越风浪交加的航运寒冬。潮起潮落间，平凡的坚守酿成星辰般璀璨的人间温情，照亮了彼此的生活，也照亮了运河悠悠流淌的时光。

兼容并蓄，同舟共济

剧中还有一条同样重要的故事线——寻根。

2008年的夏天，一条沉船从淤泥中被发现，几个家庭的过往因沉船的考证被逐渐揭开。抽丝剥茧，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，走进家族的传奇，追根溯源，终将找到个人与运河的关系。一面是马思艺回到意大利探寻自己的身世，一面是陈春带着花街“名流”追溯小院各家的过往。最终我们会看到两条线从分开到耦合，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。这个故事映照了原著《北上》中动人的兄弟情谊：1901年，小波罗带着弟弟的信来到中国寻亲，一百多年后，小波罗船上谢、邵、周、夏四家人的后人马福德的后人，在花街小院中重聚。冥冥之中，是运河水指引了他们。一对生前再没相见的兄弟，跨越时空，再次成为了一家人。运河文化的包容性，从地域的融合、代际的传承、情感的共生三个层面展现出来。

剧中的花街是运河船只汇聚的码头，这里有天南地北迁徙而来的人

群。剧中马奶奶的炸油墩子、周宴临的长鱼面、刘玉玲的绿豆糕、李燕的豆花，这些饮食细节不仅是生活本真的呈现，也暗含着由运河串联起来的“南米北面”的地域文化交融。从代际上，谢望和的太爷爷曾是翻译，父辈成为运河上的船工，而他自己，则投身互联网行业加入创业大军。几代人的身份转变，折射出运河从运输动脉到文化符号的变迁。故事的最后，花街面临改造，花街小院的五家人不得不迁出，他们却坚定地选择了到新的地方也要住在一起。马思艺初到花街时，六户人家轮流照顾她；马家陷入经济困境时，邻居们默默凑钱相助；谢家陷入伤人风波时，所有人全力支援。剧中展现的是一个小小的院落，但以小见大，从花街邻里间“非血缘的亲情”，映射的是运河带来的情感包容，这种互助并非刻意煽情，而是运河文化中同舟共济的本能。

以影像长卷致敬运河

《北上》的创作历时近七年，从文本孵化到拍摄完成，每一步都如运河行船，需逆流而上的勇气，亦需顺流而下的智慧。对我而言，这部电视剧不仅是对故乡江苏的回望，更是对中华文明韧性的致敬。

运河的生命力，在于它始终在流动中孕育新生；运河的包容性，在于它从未拒绝任何支流的汇入。当剧中夏风华回到花街的桥上眺望运河，当谢望和带着互联网思维回归花街，我看到的不仅是角色的成长，更是一个民族在传统与现代碰撞中的自省与超越。

《北上》是一部娓娓道来、需要沉下心来慢慢感受的剧作，它的故事有如运河之水不急不缓、自在流淌。静水流深，如果你将剧中那一个个人物当作了自己的同伴、家人，和他们共命运、同欢喜，便能从中收获真挚的笑与泪，为他们的善良赤忱感慨和兴叹。看着剧中的角色一天天长大，我们带着对每个人物的爱，为他们写下了苦尽甘来的圆满结局，这也是我们对现实里所有勤劳善良的人的美好祝愿。也希望《北上》能如运河水一般，润泽观众的心灵，让更多人听见这条河流的低语——它讲述的不仅是过去的故事，更是未来的可能。

创作谈



黄土高原不长树，长文学

□ 高洪雷

有人说，黄土高原不长树，专长文学。是啊，黄土高原太贫瘠、太挣扎、太苦难了，而苦难向来是文学的背景板和生力源，世界名著无不是在苦水里、泪水里、血水里“泡”大的。也许是“圣地延安”播下的火种和带来的气魄，“文学陕军”先后出现了柳青、杜鹏程、路遥、陈忠实、贾平凹等一批文学大家。其中最“苦”的，当属路遥。

路遥，本名王卫国，生在干冷的冬天。家里太穷了，养不活那么多孩子，父母便在他7岁那年把他过继给了伯父。按说日子该好一点，可继父家同样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。好在，继父没有让他弃学。在学堂里，他下课后通常趴在桌子上，很少去玩耍，那不是他性格腼腆，而是吃不饱，没有力气去玩。中学毕业后，他在农村小学教过一年书，因为发表了几首诗，被选为县文艺宣传队创作员，后来又被推荐到延安

大学中文系就读。大学毕业后，他成了《陕西文艺》的一名编辑，从此在文学道路上越走越远。1980年发表了中篇小说《惊心动魄的一幕》，荣获了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；1982年发表了反响巨大的中篇小说《人生》，又获了奖。接到领奖通知后，他愁眉苦脸地找到弟弟王天乐：“我要去领奖了，你借我点钱。”一个大作家居然拿不出领奖的路费，这让弟弟错愕不解。

《人生》获奖后，33岁的路遥，已成为中国文坛上的风云人物，一时风头无两。然而他并不满足，他要完成师父柳青的遗愿，为黄土高原这片苍凉的土地写一部巨著。他说，要忘掉自己写过《人生》，忘掉获奖，忘掉荣誉，忘掉鲜花和红衣毯，人不仅要战胜失败，还要超越胜利。从1983年开始，他在文学之路上没日没夜地狂奔，终于在1988年5月完成了百万字的长篇巨著《平凡的世界》，被誉

为中国城乡变迁的伟大史诗，中国普通劳动者的光辉礼赞。

该书完稿时，距离他的生命尽头，只剩下5个秋天了。

1991年春，《平凡的世界》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，并且位列榜首。得到消息，路遥第一时间给弟弟王天乐打电话报喜，并说去领奖需要钱，要求弟弟张罗一下。路遥前往北京领奖那天，弟弟从延安赶到西安火车站，不单是来送行的，还将借来的5000元钱递到哥哥怀中，并央求哥哥，以后可别获什么奖了，如果你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，我可给你找不到什么外汇。

为了完成这部获奖的巨著，路遥开启了炼狱般的日子，独自前往铜川，把自己关进小屋，埋头创作，废寝忘食。因为他生活不规律，“早晨从中午开始”，常常睡不好，吃不饱，身体也垮了。写《平凡的世界》第三部的时候，他的生

命、感情、经济都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但书中始终贯穿着励志：让青年向上，自强不息；让青年向善，厚德载物。写到激动处，他就会把笔从窗口扔出去，然后大哭一场，再拿着手电筒把笔找回来继续写。他的身体在创作《平凡的世界》时遭受了重创。他撒手人寰时，是1992年11月17日8时20分，极少降雪的关中夜里就飘起了雪花，此时黄土高原变成了素白的世界，西安城里的雪花很细，洋洋洒洒，沾衣就化。每一粒雪花都那么柔美，柔美得禁不起在稍大一点的风里飞翔，如同路遥那脆弱的生命。

作家贾平凹在《怀念路遥》一文中说，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，但他是夸父，倒在干渴的路上。

黄土高原不长树，顽强长出来的文学，根上凝着血，花上滴着泪。

（作者系山东省政协常委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）

徐乐天，1925年3月出生天津。1950年8月，他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，被分配到人民医院当外科大夫。1951年5月23日，西藏和平解放，5月底，中央要组织代表团前往拉萨，代表团中需要有一名大夫，还有司药和护士。司药和护士都好找，唯独大夫却不好找。卫生部找了好几位大夫，征求他们个人的意见，结果每个人都诉说了各自的困难，没有一位答应参团进藏。这时，他们想到了人民医院的徐乐天，便专门把他找来征求意见。当听说是去西藏，徐乐天一拍胸脯，立刻答应了。

进藏路漫漫

当时要去西藏，可是比登天还难。从陆路到西藏共有四条道。第一条是从四川成都到康定，再到拉萨。有首民谣唱道：“一二三雪封山，四五六淋破头。七八九正好走，十冬腊月学狗爬。”这条道路之艰难可见一斑。第二条是从陕西西安出发，经青海，过唐古拉山、通天河，再到拉萨。唐朝时嫁给吐蕃松赞干布的文成公主，走的就是这条道。当时她走了一年多才到拉萨。第三条是从新疆穿越达坂到阿里，再绕道亚东到拉萨。第四条是从云南德钦到拉萨。这些道路全都曲折难行，一路上处处都是崇山峻岭。

为了尽快抵达拉萨，中央代表团选择绕道海路，经印度从我国的南部边陲进藏。1951年6月13日，徐乐天跟随张经武将军等14人的代表团，从北京南下，经广州到了香港。徐乐天等人搭乘一艘4000吨的英国商船，带着70多件行李物品，从香港乘船，经过仰光、曼谷、新加坡，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。再从加尔各答乘飞机到西里古里，接着换乘汽车到达葛伦堡。代表团一行在葛伦堡停留了几天后，接着乘汽车抵达锡金的甘托克。从这里开始，就只能骑着骡马翻越喜马拉雅山。从甘托克出发，一路向东，大约行走了24公里，好不容易才爬上了乃堆拉山口。接着，徐乐天一行来到了海拔4300多米的帕里。帕里号称世界第一高城，这也是从亚东到江孜至拉萨之间商旅行人的必经之地。从江孜到拉萨的山路，大概是一路上最好走的路了。砂石铺就的道路比较平坦，徐乐天他们骑马前进，速度也快了。

9月8日，徐乐天终于抵达拉萨。这一路奔波，跨越上万里，走了将近三个月。徐乐天医务组一行三人是新中国第一批进入拉萨的医务人员。

走进藏族民众

刚到拉萨时，徐乐天一行住在拉萨市中心八角街对面的一处三层楼的藏式建筑。在二层的一间屋内，徐乐天摆放上桌子、凳子、一个药车、血压表之类的用品。这便算是用来给病人诊治的检查室了。因为病人不多，徐乐天此时的主要任务是应邀去家访看病，送医上门。

经过一年的筹备，拉萨市人民医院正式揭牌成立。徐乐天担任外科主任。

到西藏之前，各地派去的医疗队都了解到西藏地区白内障的发病率高，所以都随身携带了精致的眼科器械，唯一没有带来的是眼科医生。面对着那么多的患者，也有很好的医疗器械，可是却没有主刀大夫。身为外科主任的徐乐天意识到，或许这个重担就该由自己来承担。尽管此前他并未接触过眼科手术，但是，丰富的临床经验使他有信心给患者做好眼科手术。

白玛大妈已经50岁了，双目失明多年，脸上布满了皱纹，头发发白，显出与她这个年龄并不相称的苍老的模样。在翻译的帮助下，徐乐天帮助她取出了一只眼睛中老化的晶体核，白玛大妈隐隐约约地看见了一些光明，便禁不住用藏语大声叫喊起来“嘎布睿！”“嘎布睿！”旁边的翻译告诉徐乐天，大妈在喊“白色的”“白色的”。原来，失明多年的她终于能看见光亮了，因此激动万分。

新闻报道了这位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的故事。拉萨文工团得知此事，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增进百姓与军队鱼水情深、人民政府为人民带来幸福和光明的故事，于是专门派创作员到拉萨医院去采访。不久后，他们便编出了一个《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》的舞台剧，并且陆续在西藏各地上演。这部剧打动了很多藏族民众，也让许多罹患眼疾乃至失明的人看到了希望。他们纷纷找到拉萨医院，请求给自己做手术。

家属举办感谢会

有一次，一位藏族同胞在家里整理火药时，不慎发生了爆炸，结果把面部炸得鲜血淋漓、血肉模糊，昏倒在地上。他的家人吓坏了，以为自己的亲人

援藏医生第一人

□ 李朝全

活不成了！一家人嚎啕大哭。邻居听见爆炸声和哭声，纷纷围过来察看。看到倒在地上一一直在流血的乡亲，他们立即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连忙对那一家人说：“听说拉萨人民医院的大夫医术很高明，他们能让盲人的眼睛睁开，他们也一定能救活你们的亲人。”于是，抱着一线希望，大家一起动手，帮着把昏倒的伤者抬到了拉萨市人民医院。

徐乐天立即给患者做了检查。他指挥医护人员，给患者的伤口进行及时的止血清理。经过包扎，止血住了。好在失血还不算太多，加上止血及时，没过多久，那位患者便从昏迷中清醒过来。看到自己的亲人醒过来了，藏族同胞非常激动，万分感激，认为是徐大夫救活了他们的家人，他们双手合十道：“徐大夫，您真是活菩萨！是毛主席派来的神医啊！”徐乐天摆摆手说：“虽然血止住了，人抢救过来了，但是因为失血较多，还需要留在医院里观察治疗。”

藏族同胞听从了徐大夫的建议。医院对患者进行了精心的护理，及时地换药。一周之后，那些伤口都陆续地愈合结痂。加上医院营养搭配得当的伙食，这位受伤者很快便恢复了健康，开始能够自己下地行走。

当看到亲人又活蹦乱跳恢复原样站在自己面前时，那一家人都无比激动。他们一再地表示，共产党的恩情太重了，医生对他们太好了，他们一定要好好感谢医生！但是，徐乐天坚决不接受那家人赠送的各种礼物，更不接受他们给予的钱财。那家人觉得，实在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激，于是便一再地找到医院领导提出，他们要为此专门开一次感谢会。

医院领导经过研究，认为这也是一个促进医护人员同当地百姓密切感情的好机会，于是便同意了。

几天后，在拉萨医院门外的空地上，隆重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患者家属感谢会。

戴着圆顶毡帽的藏族同胞站在台上，手里拿着稿子，含着泪花，一句一句地朗读着发自内心的感激之词，感谢那些为他们救回了亲人的医生，衷心感谢毛主席，感谢中央人民政府，感谢解放军，衷心祝愿这些人民的好医生吉祥如意！

在1951年动身进藏之前，组织上告诉徐乐天，他去西藏只是去出差，时间也就是三个月。然而，等真的到了拉萨，徐乐天切身感受到了当地缺医少药的严重情形，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推迟离开西藏的时间。1953年4月，在拉萨医院不断壮大，内地前来支援的医护人员越来越多，医院外科医师队伍逐渐健全之后，徐乐天，这位援藏医生第一人，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自己热爱的这片土地和人民，回到了北京。

在北京协和医院，他在几位医学前辈的引领下，开展胸外科手术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经验丰富的他修炼成了协和胸外“一把刀”，成了名扬天下的胸外科专家。

2020年9月23日，徐乐天安静地走了。这一年，他96岁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）

